

怀念我亲爱的父亲

王 宪

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管医学研究所副所长）

12月22日晚上，我像往常一样到医院看望了父亲并谈了一些有关工作上的事情，等到他安详地休息后，我离开医院去实验室做实验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这竟成了我和父亲最后的会面。24日凌晨，父亲匆匆地离去了。至今，我仍然沉浸在巨大的震惊和悲痛之中。来自海内外的200多封唁电、信函如雪片一样，从四面八方飞来。1月5日，500多人，顶着寒风，伫立在八宝山大礼堂外，等待着给父亲送行。泪水遮挡了我的双眼，但往事却一幕幕出现在眼前。

勤奋一生思报国 父亲生活的年代，跌宕起伏，是今天许多年轻人难以理解的时代。正是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和磨难，阅读过大量爱国志士如闻一多等人的爱国诗篇，饱尝过当亡国奴的苦难，他对“科学无国界，但科学家有祖国”这句名言，刻骨铭心。他一生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，中国的科学家。正如他在遗嘱中谈到的那样：“我一生自愧成就很小，唯一安慰的是，我于解放初能回归祖国，为祖国人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”他说：“自己出身于一个劳动人民家庭，是由人民的血汗养育大的，我家穷，我爱我的心地善良、勤劳一生的父母；我的国家穷，我爱我的有着几千年文化的祖国。我不愿在国外长期寄人篱下，为他人做嫁衣裳。”他还说：“我一无意于官场、二无意于发财。我不怕吃苦，愿意走自己的道路，做一名创业者，在祖国土地上成

自己的‘家’，立自己的业，哪怕一切从零开始，也心甘情愿。”

1950年底，他回国后白手起家，从零开始，建立了消化—内分泌研究室。经过半个世纪的科研和教学，共培养消化生理专业人员近120名，使我国在消化生理学科形成了一支较好的队伍。我1988年回国时，他大力支持我创业，经常在大方向上给我指点、把关。从我的科研思路，到实验的每一个小环节，他总是细心倾听，认真指导。父亲庆幸我赶上了一个可以干一番事业的好时光，而不像他自己，曾在人生最好的年华被各种各样的运动制约着。他看到我能够回国，如同他当年一样在自己的国家创业，非常高兴。但是由于我的爱人和孩子因种种原因不能回国，他也担忧和疑虑，并多次考验性地问我：“你不是为照顾我们二老，而与爱人和孩子分开，留在国内的吧？”当我告诉他“我离不开自己的实验室，我真的是对我从事的职业感兴趣”时，他十分欣慰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我常常想：父亲回国时，我们的国家刚刚解放，百业待兴，他又正值年富力强，充满激情和活力，但他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。他白手起家，建立起实验室，才有了一点眉目，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就把他40岁至70岁一段人生最好的年华都大量地浪费了。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，改革开放以后，年近70岁的他，才又兴致勃勃地投

入到他所挚爱的科研、教学中。我真的忘不了那时的父亲，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他忘却了挨批斗、靠边站、下乡劳动的苦难，掩藏起文革中 26 岁的儿子因公牺牲带给他的悲伤，重振旗鼓，再创佳绩。相反，我也看到与父亲同时期留美的一些学者当时没有回国，现在在国外有花园、洋房、汽车，回国探望时，不仅本人感到很神气，也受到各方面的优厚招待。相比之下，我曾问过父亲后悔不？父亲回答：从来无怨无悔。这在他的遗嘱中证实了。我回国十二年了，当我在工作上碰到困难，或看到管理制度方面的不正之风，免不了在家抱怨时，他总是耐心地开导我：“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。”我在他的影响下，总是尽全力，做好我该做的事情，而不再怨天尤人。父亲正如他的学生所评价的那样，“是一位深具使命感的科学家”。

严谨治学重品德 父亲治学严谨和注重品德修养是众人皆知的。他常说：要做好学问，首先要做好一个人；治学和做人是一回事，都要实事求是。他一方面提倡在科研中要大胆创新，另一方面又强调应有实事求是的科学道德作风。他经常教育我，做科研要有耐心和恒心，要甘于寂寞和清贫，特别是要反对夸夸其谈、浮躁作风，要实实在在地评价自己的工作，有一说一，绝不夸大其词。父亲在批改我的文章时，经常把文中涉及到“我们首先发现”一类的词划掉；他时常告诫我，在文章署名时，不要追逐名利，争抢排名，古人不是有句名言：“吃亏是福”吗？宁让自己吃点亏，也从不和他人计较，正是他的为人处世之道。他一生中，发表过许多文章，指导过许多学生，但只要不是由他主要设计指导和直接参加的工作，他绝不在文章上署名，他经常在修改完第二导师指导的自己研究生的文章后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划去自己的名字。

父亲常说：“做科研的目的在于创新。”这也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。他主要从事内分泌与消化的研究。无论是在科研条件极为困难、与国外信息无法交流的情况下，还是在经过长期政治运动后已年高体衰的时候，他都时刻牢记“创新”二字，不断开创出新的研究方向。他经常询问我的研究工作进展情况，不断提醒我，要大胆设想，拓宽知识面。他说不要怕失败，要敢于开创、还要多开展跨学科的研究。他还把科研上的创新运用到教学上。提倡要研究教学，研究如何育人。他认为教书是写“活论文”，因为你的学生成长得越好，你所交的“活论文”质量就越高。早在二十年前，他开设的消化-内分泌高级课就采用了教师、学生一起讲的方式。他说老

师在课堂上，应该提问题去启发学生独立思考，而不是一言堂。他坚决反对导师动脑，研究生动手的培养方式。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，在晚年写了一系列教书育人的好文章，其中在教书育人方面，还提出了很多有见解的创新性理论。不因循守旧，敢于创新，贯穿于他的整个教学、科研、办杂志和著书中。他是一位思想永远不老的老人。

最让我感动的是，为了写那些科学家发明创造过程的故事，他在 80 多岁高龄时，还给自己规定了每个星期用三天时间，去图书馆找资料，还让我和他的学生，从国外查阅并复印了大量文献。

我十分钦佩父亲永不服老的性格。父亲到 70 多岁，一直保持着每天三个单元的工作时间，晚上仅看看新闻联播，89 岁时完成了《细胞保护》、《生理学史》、《生命科学今昔谈》等书后才休息了一年。但为此，他却感到十分内疚。他说：“我不该浪费时间，我得再制订新的写作计划。”于是在他的倡导下，《生理科学进展》创立了“科技大师”栏目，他从美、英、加拿大等国，四处寻找资料。直到他生病前的几个月，因心衰下肢浮肿，可他仍然坐在桌边，一写就是几个小时。为了让这个新设立的栏目更加吸引人，他多方写信，请老朋友一起写文章。在完成了新世纪第一期《生理科学进展》此栏目的第一篇文稿后，他就与世长辞了。从父亲的身上，我深深感受到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品德和境界。

淡泊名利终一生 父亲一生严于律己、宽以待人的品格，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、感染着我。1999 年，学校新建的公寓中，专门有院士房，领导曾劝他搬进去，但被他谢绝了。我当时对他的做法很不理解，他慈爱地看着我，讲起他一生的做人原则。他说：“我是农民的儿子，经历过贫穷、饥饿、家破、国亡的动荡社会，也饱尝过寄人篱下、遭受歧视的屈辱。我知道事业和国家对我们的重要。从回国那天起，我就给自己立下信念：只有在事业上永无止境地追求，不能在生活中贪图享受。”我虽然没有父亲那样博大的胸襟，但也深深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。之后不久，父亲为我写下一首诗：“淡泊名利终一生/灯红酒绿似烟云/忠诚勤奋思报国/清廉朴素教子孙/但求正直无私意/不做趋炎附势人/此生来日无多也/白鹤黄鹄任我乘”，这是他真实思想的写照。

作为院士，父亲家里一直用着 50 年前买的旧书桌、旧五斗柜，他的床是一年前才换掉的；他几十年集客房、书房、卧室于一室，生活、工作全在其中；他的领带，是 50 年前回国时买的，衬衫旧得一查体就

碰破，毛衣打了好几个补丁。他是因为没钱吗？不！他多次捐款给灾区及困难同事。他在遗嘱中，还要求捐给老家乡村小学一些钱，因为他在那里受过初小教育，还当过一年多小学老师，他要表示他对小学的一点点回报。他的亲属很不理解，一个外甥在农村埋怨说：“我大舅捐那么多钱给别人，还不如把那些钱捐给我呢。”他知道后，没有往心里去。在定编定岗工作中，学校明文规定院士为 A1(特殊岗位津贴)岗，但他主动放弃了。他说：我老了，做不了 A1 岗的工作，不该上岗，让年轻的、更有作为的同志上岗吧。我虽然被教育部评为特聘教授，但是每每和父亲相比，总是内心有愧、自叹不如。

我母亲大学毕业后，曾在协和医院工作。为了照顾父亲，她很早就离职停薪，没有公费医疗。母亲后来身体不好，与父亲吃相同的药，我有时就想多开点，分给母亲吃。他坚决反对，严厉批评我这样做是错误的，他说：该自己承担的，就要自己承担，不能占国家的便宜。他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诫我，给我妈一定要单独开方买药。

父亲待人厚道、朴实无华，无论是谁，一视同仁，连保姆也视同家人。我家粗茶淡饭后，总要有一些水果，他每次都要分给阿姨吃。他一生从未与人闹矛盾，总是以诚相待周围各层次的人。他常说：一生自愧成就很小，总想再尽力做些什么。在遗嘱中他说：“将遗体捐赠给学校解剖科，只要哪一部分有用，应尽量使它有用。”还说“对图书馆有用的书都捐赠给学校图书馆”。他像一支蜡烛，燃尽了自己，照亮了别人。

清廉俭朴教子孙 我的家是一个传统的家庭。父亲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。尽管他曾出国留学，后来在北京生活、工作，但他始终没有忘记生养他的父老乡亲。他的弟、妹们都在农村，生活并不宽余，他半个世纪如一日地资助他们。他的遗嘱是 1996 年写成的，那时叔叔姑姑还健在，他十分挂念他们，嘱咐我把他不多的钱物，在照顾母亲的同时，分给叔叔姑姑一部分，另外再捐给乡村里的小学一些。

使我记忆犹新的是父亲对我哥哥、对我和我的儿子的疼爱与严格要求。60 年代初，苏联卡我们脖子，不再援助我们石油，我的哥哥正值血气方刚的

年龄，自愿报考北京地质学院，选择了地质勘探专业。他的目的十分明确：为祖国找石油。毕业分配时，他又主动要求到西藏、东北去工作，父亲为自己的儿子有志气而感到欣慰，大力支持哥哥的选择，从没因为只有一个独生子而阻挡他。后来，哥哥在野外工作因公殉职，定为烈士。父亲去大庆油田料理丧事，看到那里连他自己都无法形容的艰苦环境后，多次悲痛地说：“我一生唯一后悔的，是没有帮儿子选专业，没有阻拦他去这么艰苦的地方工作。”作为父亲，他为自己的疏忽而心痛。但在痛苦之中，他没有埋怨油田，而是把油田给哥哥的抚恤金全部捐给了油田，为哥哥报效国家做了最后一点儿贡献。

对于我这个女儿，父亲从不娇惯，而是经常教育我要独立自主。我从 16 岁参加工作以后，就养成了一个习惯：回家吃饭，每月交饭费。刚开始工作，工资不高，后来又因经常出国，工资不够用，常向父亲借钱。但是我很快攒够了就马上还给父亲，从不贪图吃现成饭。失去哥哥以后，父亲 30 年来虽只剩我一个女儿，但一贯教育我要靠自己的能力，而不是靠老子的面子、钱财过日子。

人说隔代易溺爱，但我们家是个例外。我的儿子是他唯一的外孙，而他总是要求我严加管教。他说，小孩子是要管的，要让他吃一点苦。他总是批评我管教儿子不严格。但是，当他知道我的儿子考上大学后，十分高兴，把一生点点积蓄起来的 4800 美元一次送给我儿子，资助他上大学。其实，这笔钱的大部分，是我刚回国工作，因工资低不够生活时，用美元一点点与父母换成人民币，他们才积攒起来的。……父亲的慈爱是厚重的，厚重得让我有一种使命感。虽然他在遗嘱中将他有限的财物分给了叔叔、姑姑和家乡的小学，但是他将他最宝贵的遗产——他做学问、做人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风范，留给了我和我的后代，这是我一生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财富。我只有加倍勤奋地工作，不断学习，努力开拓，继承父亲的美德，学着父亲那样做人，并传至后世，尽自己的全力为祖国多做一些贡献。

亲爱的爸爸，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！